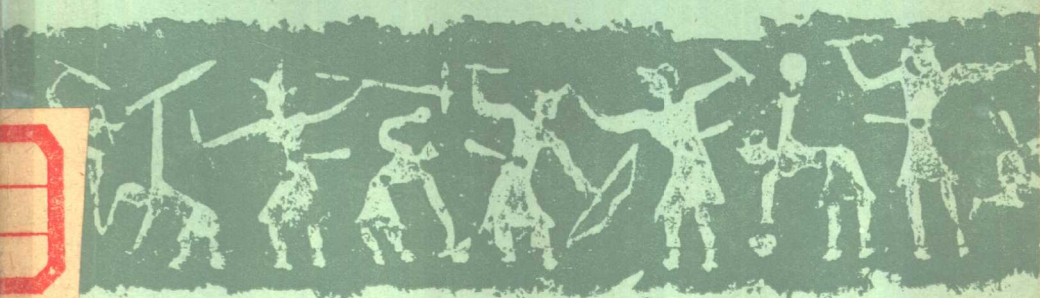


库存

春秋时期的步兵

蓝永蔚 著



中 华 书 局

春秋时期的步兵

蓝永蔚 著

中 华 书 局

1979年·北京

春秋时期的步兵

蓝永蔚 著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8 印张 10插页·186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800 册

统一书号：5018·17 定价：1.05 元

前 言

本书是作者学习我国古代军事历史的一个粗浅的习作。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想通过系统的史料考证,对我国古代步兵战术的产生过程,进行一个比较翔实的考核,并试图在此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探讨这一过程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

革命导师恩格斯十分重视军事史的研究。恩格斯第一个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了欧洲各国军事发展的历史,揭示了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以及它们的特点、装备、战术、编制和训练方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阶级结构。恩格斯所撰写的数量可观的军事史著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奠定了科学基础。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样十分重视军事史的研究。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结合我们民族的特点,在系统地研究我国现代革命战争的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研究我国古代战争的方法和途径。毛主席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里撰写的不朽的军事理论著作,都具有十分丰厚的军事史的广度和深度。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一文中所指出:“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军事典籍和军事学术遗产。我们要吸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下来,使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更加绚丽多采。毛主席在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几十年的斗争中,在这方面所做的,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最好的榜样。”可见,军事史的研究,和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科学技术史的研

究一样，也是史学工作者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作者所以不揣固陋，倾十数年的精力来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正是想制作一块引玉的砖瓦，以唤起有识者的兴趣，求得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繁荣。但是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庞杂，所依据的史料又十分繁复，加之作者本身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以及有关的学识素养都很低，错误和不当之处一定很多，可能不胜引玉之责。作者希望在客观的考验中，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以求进一步提高。

本书的写作，是在整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作者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曾经查阅了四百余种书籍和论文，其中：凡直接征引和参考者，均已将出处随文注明，不敢有一丝掠美之意；而对于一些不能同意的见解，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据理辨析。作者不敢相信自己见解的必定正确，但是敢于相信，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对于澄清史料和明辨学术是非，却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写作的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五年写成第一稿的长编，题名《车战遗痕》。一九六七年更名《春秋时期的步兵》，后经三次修改，于一九七四年脱稿。一九七七年再次修改，一九七八年又进行了最后校订。先后历时一十六年，大改四次。这固然是由于课题的艰深，业余研究条件的限制，以及作者学识的浅薄，但是，“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使作者损失了几年最宝贵的青年时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举国上下，意气风发，跟随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开始新的长征的今日，作者深感此书写作费时之长和所获之微，并决心刻苦自励，加快步伐，跟上这一日千里的峥嵘时代。

本书的修改和出版，是在中华书局编辑部第二编辑室有关同志的帮助下进行的。在一九七五年春至一九七六年夏，这一段四

害横行的阴郁日子里,第二编辑室的同志们能够支持本书的修改,并且抵制了“四人帮”评法批儒的反动史学观点,使作者深受鼓舞和教育。本书在修改中,还得到科学出版社第四编辑室、北京图书馆、安徽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热情支持,并先后于一九七七年春和一九七八年春,得到中华书局杨伯峻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同志两位老师的亲自指教,在此谨致谢忱。

蓝永蔚

一九七八年六月七日 于合肥安徽大学

目 录

前言	i
一、春秋时期战争概说	1
春秋时期的战争	1
春秋时期战争的特点	7
车战溯源	13
再论春秋时期战争的特点——车战盛衰和步兵兴起	23
二、春秋时期步兵的组成	37
步兵词义略考	37
隶属步兵和建制步兵	42
车卒(徒)组合的基本单位——乘	53
战车分类	59
隶属步兵的组成——步卒和徒	72
三、隶属步兵的编制	84
两种军赋制度的争论	84
春秋时期的攻车编制	89
春秋时期的守车编制	102
步兵的基本编制单位——伍	110
步兵的基本战术分队——两	123
卒与乘	128
附录一：《司马法》书考	131
附录二：《李靖问对》伪辨	148
四、春秋时期军队的战斗队形——阵	157

阵说	157
阵的基本形态	161
阵形的变换	169
鱼丽之阵初探	175
第一个独立的步兵方阵——魏舒方阵	180
战车的初级战术编队——旋转、双车编组和角	184
雁行之阵	191
五、春秋时期的野战和要塞战	198
春秋时期的战略和战术	198
军队训练	205
步兵的单兵和队列动作	215
野战进攻战术的发展	221
要塞战简述	232
要塞进攻和防御	240

一、春秋时期战争概说

春秋时期的战争

研究春秋时期的步兵，首先需要了解春秋时期的战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①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是战乱频繁的时代。在将近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仅据鲁史《春秋》的不完全记载，就发生过四百八十三次军事行动，其中还不包括多次的奴隶起义战争^②；其它如：聘问、朝贡、盟会等政治活动，也大多与战争紧密相关。由此看来，战争，这个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在我国历史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春秋时期，确实居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春秋时期的战争，含意广泛。就其政治目的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一）华夏诸国与戎狄族的战争。春秋时期，散处东海之滨的东方诸夷，相继为齐、鲁等国吞并；南方蛮夷被楚统一，自立于华夏诸国之林，民族界限逐渐消失。因此，当时各族间的战争，主要是华夏族同西方和北方戎狄族之间的冲突。戎狄族自西周以来就不断袭击中原^③，据《小孟鼎铭文》记载，康王时就曾与戎狄族大战^④，历时二百数十年之久，人民“靡室靡家”、“不遑启居”^⑤，至昏瞽的幽王，西周终于被“缙、西夷、犬戎”攻灭^⑥。平王东迁后，戎狄族继续威胁东周，并逐步向黄河流域进逼，伐郑击齐，亡邢灭卫，一直攻

入周王朝的腹地^⑦。这种情势迫使混战中原的华夏诸国联合起来，进行抵抗。据《左传》记载，从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公元前六三七年的八十六年当中，戎狄攻华夏十六次，华夏攻戎狄九次^⑧，其中以齐、秦、晋等国与戎狄战事最为频繁。齐是东方大国，桓公时联合燕、郑等国大败北戎并制止了狄人南进^⑨。秦、晋两国在西周时都处于戎狄包围之中，至春秋初期才相继壮大起来，成为拱卫中原的屏障^⑩。故自春秋中期以降，戎狄威胁大为减轻，华夏族与戎狄族的战事也就渐渐稀疏了。

（二）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战争。周代封国林立，据传说，武王时有国八百，到春秋初期，还有封国一百三十一一个^⑪。封国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埋下了兼并争霸的根苗。兼并之风，西周就已开始。据厉王时代的《散氏盘铭》记载，矢国就曾侵扰过散国的城邑^⑫。不过，那时的周天子大致还有予夺的权威。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急剧衰落，丧失了控制各封国的力量，诸侯兼并，大国蜂起，霸主迭现，终于演成绵延二百数十年之久的兼并与争霸战争。

郑国首先从中原混战中崛起；齐国代之而兴，侵蔡伐楚，观兵召陵，成为中原霸主。在秦国于公元前六四五年的韩之战，饮马黄河，踊跃东进的同时^⑬，楚国也于公元前六三八年大败宋襄公，挥戈北上^⑭。这时的中原，齐势稍衰而晋国勃起，成为秦、楚的劲敌。于是，从公元前六三二年的城濮之战开始^⑮，以秦、晋、楚、齐为中心，接连爆发了殽之战^⑯、彭衙之战^⑰、令狐之战^⑱、大棘之战^⑲、泌之战^⑳、鞏之战^㉑、麻隧之战^㉒、鄢陵之战^㉓、栢之战^㉔、平阴之战^㉕、湛阪之战^㉖、朝歌之战^㉗等多次大战。在战争漩涡中，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不定，局势错综复杂。郑国的霸运是短促的，宋襄图霸也如梦幻，齐国早衰，秦国后起，长期争霸中原的主要是晋、楚这两个大国。而在公元前五四六年，宋国的弭兵大会以后^㉘，中原争霸的烽烟刚熄，南方的吴、越却又点起另一次争霸的战火。但是，随着

阶级斗争的发展,这时兼并战争开始转向各国内部;吴越争霸已经是春秋霸业的尾声了。

长期的兼并战争,造成了大量封国的灭亡。到战国开始时,春秋初期的一百三十余国便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和十几个奄奄待毙的泗上小侯了。

(三) 奴隶起义战争。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得到新发展的春秋时期,这个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春秋时期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各国,并且从单纯的逃亡迅速发展为有组织的武装起义。起义奴隶据守深山大泽,同奴隶主军队展开了英勇搏斗。据《左传》记载,从公元前六四四年的齐国筑城奴隶暴动开始^②,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沈、陈、梁、郑、楚、卫、周等国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沉重地打击着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公元前六四一年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曾经导致梁国的灭亡。时隔一百二十二年之后,楚国的奴隶主提起这件事,还有谈虎色变之感^③。公元前五二〇年,在王子朝与周王的内争中,宗周的手工业奴隶奋起反抗周王室,一度赶跑了周天子,并和王军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战斗^④。公元前四七八年和公元前四七〇年,卫国手工业奴隶连续起义,将卫庄公和卫侯辄相继驱逐出境^⑤。天子被赶走,诸侯被赶走,连称霸一时的楚昭王也几乎丧命在起义军的戈下^⑥。起义战争的风暴使统治阶级惊恐万状,发出“惟命不予常”的哀叹。

(四) 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战争。从春秋中期开始,在一些国家内部,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渐趋明朗。公元前五七四年,晋国新兴势力郤氏和旧贵族栾氏首开战端^⑦。这是晋国内部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之间争夺政权的一次战争。但是,这种战争还没有成为当时战争的主流。公元前五四六年,宋国弭兵大会以后,当南方的吴、楚、越三国鏖战方酣之际,黄

河流域的中原诸国却由于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陷入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激争而无力外顾了。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战争开始转变为各国内部的夺权战争。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春秋时期，伴随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在各国奴隶主贵族身边崛起了一批虎视眈眈的新兴地主。他们依靠新型生产关系，形成势力强大的“私门”。“私门”与“公室”之争愈演愈烈，晋国内部，一场酝酿已久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夺权血战终于爆发了！公元前五五〇年，经过二十四年积聚力量的晋国新兴地主阶级，再次向旧贵族发起进攻，一举夺得政权^⑤；公元前五三二年、公元前四八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年，齐国田氏三战三捷，彻底扫荡了腐朽的旧势力^⑥；公元前四七九年，楚国白公胜厉剑而起，劫王夺宫^⑦；战火燃遍江、汉、中原。黄河中、下游宋、卫、陈、蔡等古老的奴隶制国家惊恐震怖、动荡不安。大批奴隶、平民参战，奋勇攻打奴隶主贵族的城垒王宫，成为这个战争的主力军。新兴地主阶级凭藉奴隶和平民的支持取得了最后胜利，新型的封建制度在战争烽火中诞生了。

毛主席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⑧从春秋时期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出发^⑨，凡属促进封建、统一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反之则是非正义战争。以上所述：奴隶起义战争、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战争以及华夏诸国抵御或狄族袭扰的民族战争，消灭了奴隶制度，建立了封建政权、保护了人民安全、促进了历史发展，因而是进步的正义战争；而奴隶主阶级镇压奴隶起义、掠夺其它部族、坚持奴隶制分封割据的战争则是阻碍历史发展的非正义战争；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战争，其本质属于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倾轧，但是，从其主流来说，它颠覆了周天子的王权，破坏了周王朝的旧秩序，铲除了诸侯的封疆，为历史发展扫清了道路，因而也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以上是春秋时期战争的概况^⑩。

春秋时期的步兵,就是在这样深远壮阔的战争舞台上产生的

注:

①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55页、一九六八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同)。

② 鲁史《春秋》从公元前七二二年(鲁隐公元年)起至公元前四八一年(鲁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又本文统计数字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77页。

③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匈奴传》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索隐》曰:“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

蒙文通说:“獫狁者实羌荒之族,而侵暴中夏。殆即后之所谓塞种者也……允姓之戎,即塞种也。吴承志氏以允姓之戎,为獫狁之后。王静安氏以隗姓之狄,为鬼方之后。说皆可从。”(《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8—9页)

王国维说:“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玁狁考》)。

郭沫若说:“‘戎’和‘夷’一样,是一种民族称呼,没有任何褒贬的意味”(《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42页)。

马长寿说:“关于狄的名称,过去有许多望文生义的解释,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比较合理的,狄可能是后世所谓‘狄历’或‘丁零’的简译,是由‘Türk’的原音翻译来的”(《北狄与匈奴》第1页)。

④ 《小孟鼎铭文》:“王孟目□□伐鬼方,□□□□□执鬯三人,获戡四千八百□二戡,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孚车十辆,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见吴式芬:《攷古录金文》卷三之三,四十二;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录编19)。

⑤ 见《诗·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⑥ 见《史记·周本纪》。

⑦ 据《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桓公六年:“北戎伐齐”;闵公二年:“狄人卫”;僖公九年:“狄灭邢”;僖公十一年:“杨拒、泉臬、伊维之戎同伐京师”。

⑧ 参考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82页。

⑨ 见《左传》庄公三十年、庄公三十一年。

⑩ 《史记·秦本纪》:“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

蒙文通说:“从晋之建国到春秋初年,中间经过四百多年的经略,晋国的疆域才发展到如清代平阳一府之地”(《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79页)。

⑪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语共列和周室同姓国家二十八国;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尚搜集姬姓二十五国、异姓四十四国、具爵不具姓的八国、爵姓全失的二十六国;以上共计一百三十一国。

此外瞿同祖据《世本》《氏族篇》考证，还有一个姜姓的向国。（《中国封建社会》第48页）。

⑫ 《散氏盘铭》：“用矢戡散邑，迺即散用田。”（见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八，三；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录编127；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图13）。

杨树达说：“《兮甲盘》曰：‘敢不用命，则即井戾伐’，按金文通用井为刑法字，戾伐连言，戾亦伐也。《宗周钟》云：‘戡伐毕都’，《散氏盘》云：‘用矢戡散邑’，其字皆从戈从类，盖戾伐之戾之本字矣。”（《积微居金文说》第37页）。

郭沫若说：“戡字旧多释戡，说为戡，伐字，案字右旁从戡，分明戡字，不得释为戡，且训伐，理亦难通。……盖此字乃段为戡，谓因失人营戡于散邑，故用田以报散氏。”（《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本文取杨树达说。

⑬ 见《春秋》僖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

⑭ 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

⑮ 见《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

⑯ 见《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

⑰ 见《春秋》文公二年：“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

⑱ 见《春秋》文公七年：“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

⑲ 见《春秋》宣公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左传》宣公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按此战背后的操纵者，实际仍然是晋楚两个大国。

⑳ 见《春秋》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郟，晋师败绩”。

㉑ 见《春秋》成公二年：“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御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

㉒ 见《左传》成公十三年：“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

㉓ 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六月，晋楚遇于鄢陵”，又《春秋》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

㉔ 见《左传》襄公十一年：“己丑，秦晋战于栎，晋师败绩”。

㉕ 见《春秋》襄公十八年：“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于齐”。《左传》襄公十八年：“十月，会于鲁济，寻涣梁之盟，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

㉖ 见《左传》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

㉗ 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遂伐晋，取朝歌，……以报平阴之役”。

㉘ 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㉙ 见《左传》僖公十六年。

㉚ 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沈尹戌说：“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

亡何待！”《左传》文公三年：“凡民逃其上曰溃”。

③① 见《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③② 见《左传》哀公十七年、哀公二十五年。

③③ 见《左传》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

③④ 见《左传》成公十八年。

③⑤ 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③⑥ 见《左传》昭公十年、哀公六年、哀公十四年。

③⑦ 见《左传》哀公十六年：“胜自厉剑”，又“秋七月，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③⑧ 毛主席：《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43页）。

③⑨ 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367页）。

④⑩ 本文对春秋时期战争情况的若干叙述，曾参考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的有关内容。

春秋时期战争的特点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①

春秋时期的战争，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将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期的战争做一个比较。

战争——这个两军相杀的流血政治，从春秋发展到战国是跨过了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可能会有这样的意见，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战争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目的不同。这种意见对不对呢？是的，春秋时期华夏诸国抵御戎狄族的战争，其目的是阻止戎狄族的南进；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战争，其目的是扩大封疆、攫取号令诸侯的霸主地位；奴隶起义战争，其目的是摧毁奴隶制度，争取自己的解放；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战争，其目的是建立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而奴隶主阶级镇压奴隶起义、掠夺其它部族、实行分封割据的战争，其目的则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奴隶制度。战国时期不然，七雄并峙，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封建制中央政权。如此看来，

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期的战争，目的确实不同。但是，这里所说的，是战争的政治目的，而不是战争本身的目的——即战争的军事目的。毛主席说：“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②。古往今来一切战争都只有这一个目的。因此，从军事学的范畴看来，这两个时期的战争的目的是并无所谓区别可言的。

可能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战争的区别在于它们的规模不同。是的，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较之战国时期，的确是小巫见大巫。春秋时期，车不过千乘，兵不过十万，战不过一天，即如鄢陵这样罕见的大战，不过“旦而战，见星未已”^③，而楚师即已宵遁了。战国时期迥然不同，战线延长了，战场扩大了，部队增多了，一次交战动辄就是几十万大军，相持数月甚至经年。如公元前二六〇年的长平之战，秦、赵两军相持于上党、长平，战线绵延一百几十里；赵军阵地以长平为中心，翼侧两垒相距三十余里^④；战幕于四月撕开，至九月赵军败降，前后持续六个月之久^⑤；战后赵军仅降卒即达四十万人，若连战斗中的伤亡失散估计在内，其兵力当在五十万以上，秦军自然也不会少于此数^⑥。这样的规模和气派，春秋时期当然是望尘莫及的。然而，“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⑦这些因素，毕竟不过是战争的表象；它们是战争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区别某一具体战争的“特殊的本质”^⑧。实际上，战争的规模自春秋以来就在不断扩大，发展到战国时期，早已从量的积累进入质的飞跃了。显然，规模大小之差，是不可能正确地、本质地区别这两个时期的战争的。

那么，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期的战争的区别究竟何在呢？

最根本一点，在于它们所采用的作战方式不同。

春秋时期使用战车作战。这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如城濮之战，晋国的军队就是“七百乘韞、鞞、鞅、鞞”驾乘修备的战车^⑨；大

棘之战，郑军俘获宋军甲车达四百六十乘，人俘却不过二百五十人^⑩；萧鱼之会，郑人厚赂晋侯的“广车、輶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也是一整套车战的装备^⑪。从《左传》有关记载看，当时历次大战，无论致师^⑫、决战，还是追击，双方使用的都是往来驰骋的战车，不单普通甲士要驱车鏖战，就连赫赫有名的楚庄王也亲率战车实施追击^⑬，而齐侯在鞌之战中，因战车“骖絙于木”^⑭，还险些当了晋人的俘虏。

当时的军队里也编有步兵。城濮之战，晋军就曾俘获楚军的步卒一千人^⑮；泌之战，楚军开始攻击时，是所谓的“遂疾进师，车驰卒奔”，当“晋师右移”之际，楚国的工尹齐则“将右拒卒以逐下军”，而晋国上军在败局已成的情况下，也“殿其卒而退。”^⑯

但是这些步卒却并非军队的主体。不仅他们所执行的战术任务都是从属性的^⑰，就连其本身在编制上也附属于战车。这些问题本书在以下各章中还要逐次进行讨论。总之，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军队的主体是车兵（甲士），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车战。

战国时期不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铁兵器广泛应用于战争，并使大量农民涌上战场。这便最终结束了车甲纵横的车战时代，使军队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彻底改变了军队的人员、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战术和战略，使战国时期的战场，异彩缤纷，气象万千。

驱车鏖战的甲士为庞大的步兵部队所代替。他们周旋在广阔的战场上。丰草长林、丘陵险隘，以及深沟高垒的要塞、田塍错落的水乡，所有这些战车的畏途，统统变成他们畅行无阻的坦途。据《战国策》记载，当时的七雄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⑱。所以，在历次大战中，交战双方都要聚集大量步兵，进行长时期的拼杀。如长平之战，一开始，秦赵两军就以步兵相接，斩将陷垒，反复争夺，最后还是以几十万步兵的搏战解决战斗^⑲。